

全球化、区域融合、跨国移民

乔治·弗提奥·塔皮诺斯

在本文第一部分,我们把移民看作是对不发达状况的一种回应措施,并讨论移民对移民输出国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们考察限制移民的政策所导致的新情况,考察以自由贸易取代移民的对策是否恰当。在结语部分,将概述移民政策的各种意义。

移民与发展

从经济角度看,移民首先是对不发达状况的回应。大多数人只要能保障有一种体面的生活,就会安土重迁,在国内讨生活。假如无望改善环境,人们便打算或被迫去国离境。一国与另一国的报酬和工作机会差别越大,移民的趋势就越强,情况总会保持均衡。移民是一种个人或家庭解决其贫困生活状况的措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国家的方式是通过工人阶级的集体努力来取得社会进步。与此相对照,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国家的模式是让有进取心的个人逃离其环境。

可是,对移民过程的历史回顾却表明,移民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需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解释。不是生活水平的差别导致移民运

动,出国的也不是最穷的人。19世纪的跨洋移民在欧洲始于工业革命已发轫的国家,而不是最贫困的国家;1960年代欧洲的第一拨移民潮也出自新兴国家(意大利、西班牙、希腊)最发达的地区。

无论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渗透,还是出于国家的开发战略,在发展的起步阶段,都会导致人口/经济平衡的剧变,这将在一个长时段内促使劳动力流动,改变人们的生活预期,使他们期望改善福利状况,并因此愿付出迁徙的代价。所有这些情况提高了潜在的移民数量,由于最发达的国家需要打工者,他们的梦想便有了更多实现的机会。

因此,经济学的分析和对移民过程的观察都表明,市场的力量,特别是移民输出国与输入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是至关重要的,这样讲并非否认输入国的移民政策也在发生作用。经济结构的改变以及劳力市场供需双方的状况是出现移民的原因,可一旦移民潮开启,生活水平的差别和业已形成的移民网络就会不断地推动移民过程。

反过来,也可以考察移民运动能否促进移民输出国的发展。经济学家把移民看

乔治·弗提奥·塔皮诺斯 (Georges Photios Tapinos) 是巴黎政治研究所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教授。他是多所国外大学的客座教授和人口科学研究国际联合会的秘书长和财务总监。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人口统计经济学和跨国移民问题。他已撰写和主编了多部著作,包括《人口统计、人口、经济和社会》,由 Le livre de poche 出版社出版。
Email: georges. tapinos @ sciences-po. fr

作是两个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即各种要素(技术和非技术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的分布。从劳力密集地区迁出的人们提高了滞留人员的边际生产率,而迁出人员寄回的工资也有助于改善留在国内的亲属的生活水平。移民的最终结果将缩小那种导致移民的生活差距。所以,移民保证了经济发展在国与国之间传递。

实际上,移民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产生移民的历史、体制、经济和人口环境的重要作用造就了各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框架,这使得一刀切式的概括面临困难。至少,我们必须判断在短期内能否增加移民的亲属的收入,必须判断剩余人口受到了多大影响,还必须判断移民对发展,特别是对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否有积极作用。其他人的分析强调,移民潮事实上累积着一种不稳定的机制。汇款实际上被用于改善移民亲属的当前生活(这是一个家庭成员出国的主要原因),所以它对于发展的影响是有限的。此外,寄回的钱有两重作用。短期,它们有助于把那些出国人员的亲属留在国内,而在长期,它们激发其他家庭成员以及一向无意于移民的其他家庭走出国门。移民史表明,要使移民促使发展,条件是输出国具备有效的工作、商品和信贷的体制和市场,而它们往往付诸阙如,这恰好就是人口外流的根本原因:移民促进发展的条件还包括适当的发展政策,以使汇款被充分利用。否则,移民只不过是独善其身的事情(Tapinos, 1974)。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欧洲国家工资的提高赶上了北美更丰厚的薪水之时,不是贸易和资本的流动,而是欧洲向北美的跨国移民,才是两块大陆实际收入趋同的关键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南欧向欧洲工业国的移民潮同样伴随着工资差距的缩小,尽管移民、开放贸易和资本流

动对经济的趋同在不同时期分别做出了不同的贡献(Tapinos, 1994)。

全球化与移民

自1980年代以来,移民一直是在一种新的、矛盾的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工业国一再重申控制移民入境的政策,另一方面,这些限制政策被加强之际,正值发展中国家普遍开始人口激增,劳动力和工作适龄人口的比例急剧攀升,而就业岗位却没有相应增加。随着南北国家经济差距的加大,移民潮发生的原因被加强着。结果是非法移民卷土重来,并出现了新的入境渠道,特别是通过寻求政治避难,从而使经济移民与难民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与此同时,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则意味着进一步开放边界以利于贸易,增加资本流动,并使生产过程和资本所有权国际化。

跨国移民是否在与日俱增?移民是否构成了经济全球化的组成部分?移民统计数据就它的质量来说,无法对全球范围内的所有国家跨国移民作出评估。在最近30年,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显示,移民(那些在国外出生的人)的数量从1965年的7700万,增长到了1990年的1.11亿。但是,在这个时期里,移民在全世界人口中所占比例仍大致稳定(占世界人口的2.8%) (Tapinos and Delaunay, 2000; Zlotnik, 1998)。这个数字并不包括短期移民或大多数非法移民。如果他们被包括进来,那么本时期应该是略有增长的。但无论怎样,我们还没有看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可是,移民的地理分布却有所改变。移民的比例在发展中国家下降了,在发达国家则显著增长(从3.94%到5.89%)。国外出生者比例在允许移民定居的国家为最高:美国9.3%,加拿大17.4%,澳大利

亚 21.1%。另一方面,目前欧洲的外籍劳工最多,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的增长也最快(从 3.3%到 5%)。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员在发达国家整个移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变化显著,特别是在那些允许移民定居的国家。在美国,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移民比例从 1960 年的 33%增长到 1994 年的 77%,在加拿大从 1961 年的 8%增长到 1992 年的 80%。新的移民潮在没有特殊关系的国家之间涌动:于是,斯里兰卡人、菲律宾人和摩洛哥人大量出现在意大利。许多以往输出移民的国家或地区——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还有不那么典型的如日本和台湾,都已变成了移民输入国家或地区。

移民的类别也发生了变化。在欧洲和美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非法移民和短期移民的增长。例如在欧洲,是家庭重聚以及短期移民变永久移民的类型。短期移民由于受签订的工作合同限制,按规定合同到期时必须离境并禁止其家人来团聚,它作为全球化的征兆不是由于它那尚且有限的数量,而是由于涉及各类情形。这里包括短期性质的工作,例如由雇主派遣出国去执行公务,或者是为永久性的岗位而进行选拔。

所有这些就意味着人口流动的全球化格局吗?自然,由于打算移民的人要多于输入国打算接收者,移民问题确有其全球的一面。以下情况也属实,即虽然欧洲与北美的意识形态有差别,导致其不同的管理移民的制度(这包括有关移民政策的立法和法律框架、入境期限和条件以及它们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还有归化入籍的规定),可它们却都有限制移民。但是,生产、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进程是以另一种规模进行的,在此背景下谈论人口流动的全球化格局就有点夸大其辞了。

与此相对照,区域移民正越来越显著。移民输入国受到两种制约:一方面,富国与穷国的差距促使其制订有关国家政策。另一方面,不同经济体之间相互依赖,特别是区域范围内的组织要求有关政策在恰当层面上制订,于是在主要的自由贸易区范围内——例如欧盟及其东欧和南欧伙伴国,或者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及其中南美洲伙伴国所覆盖的地区,合作便不可避免。

跨国移民、贸易及发展理论、区域融合

一方面是移民趋势的加剧,另一方面是对移民入境的严格控制,在此形势下,开放贸易被当作是跨国移民的替代方案。但该种策略的意义却发生了变化。自由贸易引发国内要素流动,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与跨国移民相比更是一种促进专业化的切实可行的途径。它寻求阻止,不行的话则减少跨国移民——对于美国来说是非法移民,在欧洲是外来的非技术劳动力移民。正是在此形势下,在美国和欧洲确立了移民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这种设想并不新颖。在美国,如布拉塞罗计划那样的短期项目启动于 1951 年,结束于 1964 年,那时正是对墨西哥移民潮的担心,导致了针对设在墨西哥境内公司的特惠关税,即零部件进口和产品出口一律免税。结果是决定性地影响了有关地区的工业发展和就业环境,并稍稍促动了整个国民经济,但却并未怎样削弱流向美国的移民浪潮。1986 年《移民改革与控制法案》(IRCA)实施后,国会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用以观察法案效果并提出减少非法移民的措施,得出的结论是:因开放贸易和金融关系而推动移民输出的经济发展,这是惟一切实的选择。

墨西哥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除去有关商务旅行的条款)尽管并未涉及移民问题,却正适合于这种形势。

在欧洲 1973—1974 年对移民关闭边境时期,提出的补偿措施是用政策鼓励向移民输出国投资,引导欧洲公司特别是那些雇佣移民的公司,到当地建立生产车间并让移民打工者返回故国。这个“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并未实现其承诺。从那以后情况已发生变化。许多迹象表明,解决移民问题应当依循更实际的途径。首先,对移民打工仔关闭边境(它最初是针对能源危机和就业形势恶化采取的临时措施)已经变为欧盟国家移民政策中的永久性特征。第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可以理解为是发达国家为了化解南部邻国对其单方面关闭边境的批评。尽管如此,最新的替代举措的确是在移民输出国新的发展战略——包括放弃独立自主的进口替代政策——的背景下展开的。欧盟与摩洛哥、突尼斯和土耳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推动了结构调整计划以及私有化政策、降低关税壁垒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可是,在这些积极的现象之外又出现了新的担忧。自由贸易协定在某些方面意味着马格里布国家与欧盟之间特殊关系的结束。欧盟扩充成员国、同其他地中海国家及中欧国家的协定,关贸总协定的签署、世贸组织的建立以及多边协定的废除,都使得原先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协定所赋予马格里布国家的特殊优惠不复存在。鉴于此,我们能期望通过贸易自由化以及普遍的发展来缓解移民运动吗?

国际贸易理论至少提供了解答的基础。因为如果没有人口跨界流动,那么,商品自由贸易将促使发展中国家大量使用自然资源和非物质劳力,进行专业化的商品生产。其结果是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生产要

素支付逐渐趋同,就价格差别被公认为移民的根本原因而言,移民将会减少。于是,自由贸易被视为人口流动的替代方案。可是就跨国移民而言,国际贸易理论所倡导的趋同机制却留下了三个含糊地带。

正如欧洲的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在区域融合过程中,生产要素价格趋同的倾向本来应减少国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可与此同时,从没有参加特惠协定的其他国家却吸引来了更多移民。此外,均等的水准以及实现均等所需的时间都不能依据静态比较的模型加以推断。持续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究竟是通过自由贸易在未来什么时候永久地改善生活水平呢,还是通过短期移民(假如他们愿意的话),收立竿见影——或暂时——的效果?潜在的移民会进行这样的选择。缩小国与国的收入差别要求穷国在一个长时期内实现强大而稳定的增长。最乐观的估计是,50 年 6% 以上的年均增长才能决定性地缩小这种差别。然而,上述两种方案的取舍却因移民输出国政治和经济前景的不确定而彻底改观了。走出去就是为自己拿主意,留下来是将命运委托给政府和市场。如果不限制商品或生产要素流动,那么上述理论就不能预见,一个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国家,它的专业化是采取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形式呢,还是采取工人外流的形式。

虽然我们可以预见,在长时段内生产要素价格的趋同将减缓移民的动机,但同时段内(可能有几十年)经济结构的调整又将强化这种动机。在有慎重的安置移民政策的地方,比如美国,或者在因劳动力市场分化而需要劳动力的地方,比如西欧,移民输出地区生产的增长都增加了劳动力的外流。开发过程需要并鼓励劳动人口从一个地区或经济部门流向其他地方和部门。人

口迁往第二产业,特别是建筑业,增加了货币收入(这有助于支付移民的成本),并使就业情况极易受相关产业波动的影响,同时较高的教育和城市化水平也缩小了文化上的差距。所有这些因素都鼓励移民。

欧洲共同体的经验和 欧洲/地中海协定的前景

欧洲共同体在某些方面是跨国移民、自由贸易和区域融合之间关系的样板。当然,与自由贸易区不同,共同体市场谋求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跨界移民既是经济融合的目标,也是实现融合的手段。但是,建立共同体市场的时间表,以及劳工自由流动与消除贸易壁垒相比滞后 10 年的情况(对于首批签约国而言),使我们必须面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这样,我们也许可以问一问,成员国之间贸易壁垒的消除是否导致了共同体内部劳工流动量的减少,以及共同体外国家移民的增加。就统计资料可以确定的范围来看,现实似乎证实了理论的预见。显而易见的是,配额制和关税壁垒的取消,不仅在共同体国家内导致了对国外商品的更大开放(进出口同国内产品的比例),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工资成本和人均产值)以及共同体内部移民的减少,而且也导致了来自共同体外国家移民的增多。

为了透析这些现象,为了更彻底地检验理论,一方面有必要明确,收入差距的缩小正是消除贸易壁垒的结果,跨国移民运动的缓解是由于劳动力成本及人均产值差距的缩小,另一方面,也有必要看一看这种解释模型与其他解释是否相容。结果相同,但采取的途径可能不同,殊途同归的道理告诉我们,尚不能从欧洲的样板中得出什么明确的结论,但的确可以辨别出论争

中的关键点何在。实际上,收入水平趋同的情况与新古典派对不同初始条件下国家所做的增长模型是相适应的:无论怎样,欧共体的制度因素以及资本流动特别是架构基金,比之减税措施,所做的贡献更大。在一定程度上,共同体内移民的减少与共同体外移民的增多也可用失业率上升和外部国家移民顶替上岗的结果来解释(Tapinos, 1994)。

关于近来的自由贸易协定对移民运动有何影响,现在做结论为时尚早,无论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还是欧盟与许多地中海国家之间的协定,都是这样。自由贸易使发展中国家专门从事自然资源和非技术劳动力密集型的生产,这提高了从这些生产要素获得的比较利益。但是,它对若干年内的增长、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甚微,不太可能改变那些打算出国谋生的人们的计划。相反,自由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变化将在中长期内强化移民的愿望,倒是很可能的。在北美,最近对 NAFTA 之效果的观察便是这样(Martin, 1993)。在欧洲—地中海地区,为数不多的有关其影响的分析报告也并未预见到移民运动会怎样降温。

作为一个实例,我们将阐明自由贸易在中短期内将如何影响摩洛哥经济,这一阐述与其他人关于欧洲—地中海经济区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下面的模拟研究以一种可计量的总平衡模型为基础,该项研究表明,开展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与欧盟的贸易更加不平衡,税收损失 1/5,某些农产品的生产将更专业化,对增长则略有推动,不平等的状况稍有缓解(Cogneau and Tapinos, 1995)。实际上,在签署协定前,摩洛哥就已取消了配额限制并降低了关税,对它而言,自由贸易意味着进一步削减进口关税,因为它的出口,除几种农产品



包租班机从莫斯科到纽约来的乘客,在肯尼迪机场移民入境处排成长队,1994年。Sebastiao Salgado 摄影/ Amazonas/ Contact Press Tmages 供稿。

外,本来已经进入了欧洲市场。假定进出口具有弹性,进口占较高比例,那么贸易赤字和国内货币贬值就是意料中的事了。摩洛哥从事农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将会刺激该部门的增长(前提是欧盟取消限制),并改善农民的相对于城市非正式部门工薪者的境况。

但是,这还不足以推论说,欧盟国家与摩洛哥的要素价格将会趋同——哪怕是在很长的时期内。的确,我们看不到高速而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出现,除非非农业部门在经济中的作用得到加强。保持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率要求多样化的经济活动,这样才能获得熟练劳动力,才有外资流入

——无论是采取私人投资还是政府援助的形式。可是,在自由贸易的压力下,眼前的发展战略又得在当前的比较优势基础上进行专业化生产,这意味着专门从事农业。此外,吸引外资的能力仍然不足,而这种能力事实上构成了加入某个自由贸易区的一个基本依据。长期来看,情况甚至更糟,因为移民的汇款(通常大约占外汇收入的1/4)在逐渐减少。在这样的环境中,能期望那些打算移民的人们改弦易辙吗?

移民的决策

想要抑制移民倾向,移民输出国经济

形势的改观是关键所在。但上述分析表明,只有以特定方式并在可接受的时间内,彻底改变那些影响个人及其家庭做出移民决策的各种参数,经济自由主义才能成为移民的替代方案。有关决策的经济学模型以简单的行为方式为前提。假定所有条件相同,无论是短期的还是永久性移民,个人考虑移民的条件是:有希望在某个确定时间内——可能是若干年、一生乃至几代人——改善自身及其一群人(无论是家庭还是其他单位)的生活。因而我们设想实际收入差距与移民运动的频密度之间存在着正比关系。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现象说明这种相关性的确存在。但上述模型尚缺乏预测能力。首先,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必然导致移民运动;第二,上文已指出,随着穷国开始发展,两国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经常导致人口外流的出现或加剧,而不是减缓。有关移民决策的经济学分析应使上述模型能预测现实的情况。制度的、文化的或心理的因素可阻止人们选择到目标国定居,或极大地提高其心理成本。一旦认清这些因素,就需要具体说明有关行为的各种变量。

最重要的一些变量涉及迁徙的成本,以及有关得失利弊的风险。倘若不能支付路费,就不会有人去国离境,这项费用可以利用其支持网络主要是家庭来解决,或者以延期偿还的方式解决。这就使定居型移民与自愿的临时型移民区分开来。定居型移民由于居留时间长,能够偿付个人财政成本和机会成本,也就是迁移和求职期间的花费。临时性移民在欧洲国家经济增长时期,曾大量来自海湾国家。迁徙成本与移民输出国收入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解释: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收入差距的增大按理说应当推动移民倾向,但何以最开始却反其道而行之。因此,例如比索贬值时

期,按美元折算的路费立刻上涨,从而抑制了迁徙;而对于已经身在美国的人们来说,汇率的升高则减少了有意回国返乡的移民。

移民的决策还要考虑以下风险,即输出国的原有收入与输入国的预期工资相差多少——特别是要考虑到可能无法马上找到工作。但相对于工资差别,对这层风险不必过虑。有一种关于决策的微观经济学模型很有意思,它把移民看作一个家庭的对策方案,这个家庭谋求降低在输出国乡村从事家庭生产面临的各种风险,应对市场的欠缺和经济的波动,并对输出国与输入国经济周期的时间差加以利用。这种方案在现实中仍有待建立,其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明确的对策,以应对不同市场中存在的不足,它不仅涉及劳动力,而且涉及商品和信贷。通过分散风险,移民提供了一种保障,以抗衡经济和生产的起伏涨落。

对移民决策的分析应涉及移民们期望在输入国居留的时间长度。影响迁移的各种因素的性质和分量以及移民的类型,都与预期的居留时间密切有关。简言之,对打算短期移民的人,重要的是收入差距和工作机会;对打算永久移民的人,社会和职业流动的前景同当前报酬上的差距同样重要。短期移民意味着同一家庭的成员们分居于两地。其对策方案是,作为决策单位,家庭依据不同地方赋予其成员的比较优势,在一定时期将他们分散在不同地方。对预期收益的估算不仅包括实际收入的差距,还包括价格上的差距。实际上,决定性的因素是移民们开源节流的能力,以通过汇款提高其滞留在故国的亲属们的购买力。假定有一份同样的收入,短期移民与永久移民相比,为整个家庭赢得的收益要大得多。此外,永久移民不必精打细算,与此不同,对短期移民来说,其纯花费或者说移民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

即他们必须决定拿出收入的多少在东道国消费,拿出多少寄回国内。预期的迁移时间对于移民政策的效果而言,包含着有趣而矛盾的含义。实际上,东道国仅限于在特定时期内雇佣移民的决定,反而加强了那些本来不想永久居留的人们的移民倾向。欧洲国家以为通过建立临时招工制度就能限制移民的流入,其实,与允许移民定居的情形相比,这办法反倒会招徕更多的外籍工人。

移民还是贸易:为谁做选择?

移民与国际贸易作为可供选择的不同的发展途径,我们应怎样评估其价值呢?对于那些利益攸关的人群来说,这两者真是可供选择的方案吗?首先,让我们设身处地站在移民输入国的位置上,这些国家正在关闭边境,以各种方式通过开发和贸易自由化来“避免”移民入境。让我们假定:阻止打工者入境和稳定劳动人口的政策主要着眼于保护国内劳动力市场,特别是保护处于收入停滞和劳动力过剩甚至失业状态的非技术工人。自由贸易只有在能实现同一目标的前提下,才能被看作是一种替代方案。这就是说,要对比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没有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移民对就业和非技术工人收入的影响,另一种是有自由贸易而没有移民的情况。换句话说,非技术工人是更担心入境移民(要素流动)的直接竞争,还是进口商品的间接竞争?这种间接竞争是移民输出国专门从事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出口的一个结果。

对此移民输出国的立场是什么?是开放经济、抑制移民,还是允许移民而封闭经济更能改善最弱势群体的境况?自由贸易能使打算移民的大多数人受益吗?移民有助于提高平均生活水平,却无法消除不平

等状态。移民使低收入家庭受益,却不是总能惠及被剥夺的大多数。而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化的受惠者并不必然是那些打算移民的人。假如农业部门受益而损害的是公共部门以及正式和非正式行业中人,情况尤其是如此,因为打算移民的大多数人正好是城市工薪族。总之,不论贸易自由化能带来什么好处,都会有某些人群仍怀有强烈的移民倾向。

结 论

提出移民与发展之间关系问题的是移民输入国,即1970年代关闭边境之后的欧洲和1986年通过《移民改革与控制法案》的美国,其背景都是打算控制移民。如上所述,降低关税在中短期的影响微不足道,有关国家吸引私人投资和公共援助的能力也并不稳定,亟需改弦易辙。发展和合作是应当追求的目标,无论它们对移民有何种影响。

目前,对移民运动的分析重新被放在国际背景下,强调有关的两类国家彼此依存,而不像传统方法那样分别专注于甲方或乙方。但是,对于理论说明和社会现实而言,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区分越来越不明显。有关移民的讨论已经同输出国的人权、政治组织和发展等问题,同输入国的民族凝聚和未来福利国家等问题密不可分。

控制移民政策与替代移民的自由贸易方案相伴相随,其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就它们特别着眼于控制移民而言,二者都具有两种矛盾的结果。第一,那些愿意在条件成熟时再启程的人们,会比他们自己原先设想的更早动身,而向打算将来启程的人开放边境的政策,反而具有减少入境人数的作用。这种例子有许多,如在

欧国家、阿尔及利亚、墨西哥和香港。第二,控制移民的措施降低了人们返回故国的意愿,最终这可能意味着,假如允许来去自由的话,那么移民的总量就不会有这么多。

综上所述,必须在迁徙自由与定居自由之间做出区分。迁徙自由是一项人权。定居自由则是一项国家的权利,因为它是经由公民意志的民主程序而合法化的。由

于难以控制定居,各国便限制入境。欧洲特别是法国针对马格里布国家的政策就是一个实例。当然,对入境不加限制的国家将面临非法移民入境并定居的危险,但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正在形成的精英阶层出国留学的机会,考虑到国际稳定,限制迁徙自由的政治成本在长时期内又可能太高。

[祝东力译]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BUSTAMANTE, J. A., REYNOLDS, C. W. and HINOJOSA OJEDA, R. A. (eds.) 1992. *US-Mexico Relations, labor market interdepend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 COGNEAU, D. and TAPINOS, G. 1995. 'Libre échange, répartition du revenu, et migrations au Maroc', *Revue d'Economie du Développement*, No. 1.
- GARSON, J.-P. 1994.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Maghreb countries of financial transfers from emigrants', i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Partnerships for Cooperation*. OECD, Paris.
- MARTIN, PH. L. 1993. *Trade and migration: NAFTA and agricultur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 MASSEY, D. S. 1989.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4, No. 3, pp. 383-414.
- TAPINOS, G. 1974. *L'Economi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Paris, Armand Colin.
- — 1994. 'L'intégration économique régionale, ses effets sur l'emploi et les migrations', i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Partnerships for Cooperation*. OECD, Paris.
- — 1993. 'C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fer an alternative to the emigration of workers?', in *The Changing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ECD, Paris, pp. 175-182.
- — 1997.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 European Union and the Maghreb', in *Proceedings of the Mediterranean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alma de Mallorca, 15-17 October 1996, Council of Europe Publishing, Strasbourg.
- TAPINOS, G. and DELAUNAY, D. 2000. *Peut-on parler d'une mondialisation des migrations?*, *Mondialisation, migrations et développement*. A paraître.
- TAYLOR, A. M. and WILLIAMSON, J. G. 1997. 'Convergence in 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 pp. 27-63.
- ZLOTNIK, G. 199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1965-96: an overview',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4, No. 3, pp. 429-468.

念框架、调查总结,而没有造成连续性的积累。该领域现有理论存在着下列问题:只探讨造成移民现象的原因,而不顾及移民的其他方面;声势有余而实际解释能力有限;只解释现成的现象,而提不出可实证的假设。除了社会科学所共有的困难外,移民研究还有其特殊的困难,那就是:它的研究对象难于界定和测量;多方面多形态;不易理论化。现今的移民研究虽已提出不少理论和观念框架,较数十年前有了明显进步,但这对移民知识的贡献却很有限。

[黄为葳译]

全球化、区域融合、跨国移民

乔治·弗提奥·塔皮诺斯

作者首先回顾了跨国移民与经济相互关系,并将移民现象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然后考察限制移民的政策产生了什么新情况,以及以自由贸易代替移民的对策是否恰当。作者研究了经济自由化的结果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使人们打消去国离境的意愿。在结束部分,他勾勒了移民政策的各种意义。

[祝东力译]

移居、跨国社群和公民身份

里瓦·卡斯托里亚诺

随着移民的安居,在经济利益、文化交流、社会联系和政治倾向的基础上产生了跨国社群。全球范围内定居不同国家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愈益频繁;母国和移居国的文化和政治特点也与多层次、多国度的活动结合起来,造成了多重归属的制度化。

[刘北成译]

UNECE地区的国际移民:

模式、趋势与政策

约翰·索尔特 詹姆斯·克拉克

90年代是UNECE地区国际移民(人口流动)动荡的10年。虽然近年来西欧有记录的人口流动趋于下降,但没有记录的和非法的移民存在一些重大问题,有许多人认为这种移民的人数在稳步增加,虽然证据存在问题。中东欧的特点是短期、短距离的跨境流动居多,大都是为了经济目的,并利用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开放性。在北美,入境移民的主要动向很久以来就是谋求永久定居,而在西欧,多数移民至少在初期是暂时的,虽然也时常导致形成众多定居的移民群体。在90年代加拿大和美国进行的入境移民辩论似乎日益反映大西洋彼岸关切的问题。尤其在美国,“移民的精神特质”日益被质疑。本文试图通过弄清楚实际发生的事态来探讨下列问题:移民问题有多么重要?移民的模式和趋势是什么?新的没有记录的人口流动是多么突出?UNECE地区移民体制的管理人员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黄仕琦译]

跨国移民的最新趋势和主要问题:

从中东欧的角度看

马雷克·奥科尔斯基

1980年代末之前,中东欧还是一个相对来说与世隔离的地区。由于当局限制出国旅行,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流动,即使是在该地区内部,也是非常罕见的。与西方在1990年前后担心的正相反,刚刚获准自由迁徙的中东欧人并没有涌向西方。的确,已不再能见到那些群体如少数民族、政治反对派和精英分子外流。然而,却至少有